

论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人称话语的转变

陈美霞

(邵阳学院 中文系,湖南 邵阳 422000)

[摘要]20世纪30年代,冯至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经历了脱胎换骨之变,由早期的表现自我、抒写个性,变为对存在主义的现代性追求,这一转变为其在40年代《十四行集》巅峰时期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艺术基础。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的人称话语则亲历了这一转化过程,由早期诗中的“我”开始变为“我们”,诗性表达也由早期诗中的抒写自我变为对存在主义的言说,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独特性的体现。

[关键词]冯至诗歌;人称话语形式;存在主义哲学;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4)06-0075-05

The Change of Personal Discourse in Feng Zhi's Poetry in the 1930s

CHEN Meixia

(Chinese Department, Shaoyang University, Shaoyang, Hunan 422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 Feng Zhi experienced a thorough change of thought and poetry creation from the early self expression and personality display to modern pursuit of existentialism. This change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foundation for the mature acme of his work *Sonnet* in the 1940s. The change of personal discourse from “I” to “we” in his poems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such a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oetry expression is also transformed from self expression into the narration of existentialism. The change of personal discourse is the result of the encounter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poet and the times, as well as a reflection of his unique poetic thinking.

Key words: Feng Zhi's poetry; form of personal discourse; philosophy of existentialism; modernity

1927年,冯至的诗稿《北游》付梓面世,标志着诗人从此跳出了吟唱爱情与青春的狭小圈子,转而踏上了批判现实、抒写个人生存状态和追求现代性的道路。有学者曾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分为三种典型形态:信念式—终结性的“现代性”;世俗化—体验性的“现代性”;浪漫主义—“反现代”的“现代性”形态。具体而言,信念式—终结性的“现代性”“表现为一种对‘现代性’的主动性追求,突出表现为一种对于‘现代’的憧憬、向往、期盼之情,希冀社会、文化的彻底‘现代’可以通盘解决一切问

题,并以一种理想化的‘现代性’原则来批判现实和历史,由此来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按照理性主义的社会整体改革方案,将改造社会的理想付诸实践。”而世俗化—体验性的“现代性”则“表现为一种居于边缘地带、带有被动色彩的世俗化、体验性的‘现代性’态度,它注重于社会转型期的个体生存的感受和体验。”最后,浪漫主义—“反现代”的“现代性”“是一种带有边缘性的、力图超越现代性的主客对立文化而与前现代精神相通的浪漫主义的‘反现代’的‘审美救世主义’态度。”^[1]冯至的现代性

收稿日期:2014-06-2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中国当代诗歌语境下冯至诗歌研究—以冯至诗歌人称话语演变为视角”(11C1146)

作者简介:陈美霞(1977-),女,湖南常德人,邵阳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追求大致可以归入第二类。因为他所关注的不是时代本身,而是个体生存的感受和体验。

在主动探询个体人性的现代性的过程中,冯至与存在主义哲学和里尔克的生命哲学思想相遇,并将之吸纳化为自身所有,从而形成了诗人独特的生命—存在观。四十年代创作的《十四行集》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从三十年代以来创作的诗歌中的人称话语形式来看,诗人逐渐摒弃了早期诗歌中那个表达自我、抒写个人的单数主语人称“我”,选择了带有广泛性、群体化的复数人称“我们”。核心人称话语的转向不仅与诗人的思想转变有关,而且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一 现代性的呼唤:“我们”最早的心声

1928年初,冯至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在朋友面前读起他的近作《北游》,“大家认为诗的风格有了变化,与过去不同了……”^{[2]173}的确,较之前冯至的诗作,《北游》的风格已经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他开始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的思索和探究,其对现代文明的强烈愤激和义正词严的批判,对个体生命存在的焦虑和生命意义的追寻,充分体现了潜藏在诗人内心深处现代性的萌动,这也为他接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之后,诗人在艺术上也开始了新的更高的追求,1930年所写的《等待》等诗便可视作这一自发性追求的产物。如果说《北游》是诗人思想上的现代性萌芽,那么《等待》等诗则可以视为诗人在诗歌形式上的一次自发的现代性尝试。1930年9月,诗人赴德国留学,在那里,他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和里尔克、歌德等大师级人物精神系统而深刻的影响,并在留学期间写下了《无眠的夜半》和《海歌》等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作品。

(一)《北游》:现代性的萌动

《北游》是冯至哈尔滨之行的产物,体现了现代性思想的萌芽。在《北游》中作者的笔触摆脱了个人的哀愁和青春的苦闷,将批制的锋芒指向“不东不西”的畸形繁荣的现代都市和个人的生存境况。哈尔滨是当时被殖民地化了的现代大都市,那里有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还有中国的市侩、官僚买办和投机富豪,到处充斥着堕落与荒淫、病态与贫乏、血腥与血泪,生活其

间就如同在地狱里行走一般,不啻为一座现代中国的荒原。对此,冯至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的批判:“女人只看见男人衣袋中的金钱,男人只知道女人衣裙里的肉体。”“这里的人把猪圈当作乐园,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同归腐烂!”(《北游·8》)

在批判现代文明的同时,诗人又反观自身,探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提出了一些对个体生命存在状态进行审视和探究的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命题,如生命个体存在的孤单寂寞的必然命运,“临行时只思念着一个生疏的客人,他曾经抱着寂寞游遍全世……”所以“我”总感觉“好象有个寂寞的面孔向我微笑……”(《北游·3》)到达哈尔滨之后,那里的一切对冯至来说,完全是生疏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为此他感到手足无措、彷徨无助,感觉“自己好象是一个无知的小儿被戏弄在一个巨人的手中,不知怎样求生,如何寻死。”^[3]“那种孤单寂寞之感,自以为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2]173}实际上,这种孤寂的体验对冯至来说由来已久,但在这里,冯至趋向认定这种体验是一种个体生命的本质,芸芸众生,谁也没有例外。

在《北游》中,诗人还提及另外几个有关存在主义生命体验的命题:生死问题,生存状态问题,认识自我的问题以及自我选择的问题。他在诗中说:“生和死,是同样的秘密,一个秘密的环把它们套在一起,我在这秘密的环中,解也解不开,跑也跑不出去”(《北游·8》)。在这里,冯至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与认识,显然已经超越了以往限于生活现实层面的认识,具有了某种抽象的性质。这种认识虽然还没有达到存在主义向死而生的认识境界,但诗人已经开始从一般层面上探求生与死的秘密。对于生存状态问题,冯至除了体验到个体存在的孤寂感以外,还开始探询个体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世界早已不是乐园,人生是一座广大的牢狱”(《湖滨》),“上帝”也“早已失却了他的庄严”(《北游·9》)。在丑恶、荒诞的现实中,人们所信奉的理想、信仰和价值观念都遭遇瓦解,进而引发了诗人对生命存在本身的探询:“匆匆地来,促促地去,什么也不能把定,匆匆地来,促促地去,匆促的人生!”(《北游·3》)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明显的体察到诗人对现实生活不可把握、处于无根状态的深刻焦虑、困惑和思考。短暂的人生只不过是社会长河中的浪花一朵,稍纵即逝,如同昙花一现,随即被社

会洪流裹挟而去,作为个体生命,无力左右,无可拒绝,亦无可阻挡。对于认识自我的问题,诗人曾多次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我可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北游·8》)追抚往昔,“我的花儿可曾开过一朵,我的果子可曾结过一个?”这种对自我的审视、对个体的拷问,显然与存在主义追求本真自我有相似之处。最后,关于人生选择的问题,诗人在《北游》中也有所涉及,比如,立于人生的岔路口,“我”陷入迷茫:“我到底要去哪里走去”。不但如此,诗人还自劝自勉:“望后你要怎么样,你要仔细地思量”。诸如此类的字句都说明诗人已经注意到选择对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要性,为他以后接受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启了方便之门。总而言之,《北游》体现了一种现代人躁动不安的情绪——对个体存在的反思、焦虑,这表明冯至已经走上追求现代性的道路。

(二)《等待》《无眠的夜半》及《海歌》等:现代性的自觉追求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冯至敢于直面现实,却并未真正走进现实,而是作别“《昨日之歌》”,逐渐抛弃早期那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寻愁觅恨之举,将目光投向生命本身与个体存在,自发地萌生了现代主义意识,开始思考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北游》一诗就清楚地呈现了这一思想突变的轨迹和线索。不但如此,在表达方式上,冯至也不满足于以往直抒胸臆、袒露自我式的表达,诗人竭力探索,在留德前后写下了如《等待》《送》《发》《晚餐》《日落》《星期五的夜晚》《夜半的园林》《酒醒》等诗作。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大多是描写恋爱心理的。如诗中所说:所谓恋爱中的人,就是在星期五的夜晚,如同一个“垂危的人”,捱过长夜漫漫,期待天明与爱人相见的人(《星期五的夜晚》);就是在分别的每一天里,感觉像经历了“一生的苦难”的人(《日落》);就是在送别之时,自己的心已随爱人而去,只剩下一个空的、“没用的身躯”的人(《送》);就是等待爱人的心如同“天上的星、海里的水”一样永恒的人(《等待》)……这些作品虽然也主要描写爱情,但是在表达方式上,显然有别于之前的爱情诗。早期的爱情诗无不直接坦露或倾诉“我”对“你”的思念和爱慕,而在上述几首诗作中,诗人不再采取直接表白的方式,也不直接抒写情感,而是通过间接的暗示来表露心迹,将内心的情感体验形之于某种具

体物象,减少了先前爱情诗中所充溢的伤感缠绵之情,多了一份深沉厚重,多了一份凝思冷静,令飘散无形的诗意敛聚起来,投射沉积于某一客观对象。

关于此间在诗歌表达方式上所发生的变化,归根结底出自诗人自觉的艺术追求。以上作品均为诗人在1930年里所做,诗人在1930年5月12日写给好友杨晦的信中这样说:“你觉得我近来的诗怎样?我已经完全把旧的‘形式’同‘韵’抛开了。”^{[4]107}由此,足见诗人自主改变的主张。除此之外,冯至在1931年4月10日写给杨晦等人的信中则更为详细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去年暑假在北平时,我曾经幻想我的将来的诗,要望那方面努力:做一首诗,像是雕刻家雕塑一座石像。想不到来到德国遇见Rilke的诗,他后半的诗多半是一座座的雕刻。”^{[4]119}因此,《等待》一系列诗是诗人在诗歌形式上做出的大胆探索。此后,诗人背离了浪漫的直抒胸臆式的道路,转而走向雕塑一样的诗的道路。

1930年9月,冯至带着对异域文化的向往与追求,对人生意义的关怀与思考和对诗歌创作的探索与创新,踏上了留德之旅。在留学期间,也许是一种机缘巧合,冯至有幸亲耳聆听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斯的讲课,从中,他找到了他思想的耦合点,他那痛苦、焦虑的灵魂也因之得到了一个安放之所。更为重要的是,冯至正是在这时较为系统而全面地接触到里尔克和歌德的思想与创作,特别是在里尔克那里,冯至发现了他理想的诗、理想的散文和理想的艺术创作理念。

在存在主义哲学光辉的映照下,在里尔克与歌德等大师级人物精神的引导下,冯至逐渐明确了他的诗歌创作方向,从而产生了他在留学期间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几首诗:《无眠的夜半》《夜》《海歌》及《雪后》。从这四首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觉察出上述因素的影响。其中,前面两首受到歌德的影响大一些,后面两首则更多受到存在主义哲学与里尔克思想的影响。比如《无眠的夜半》这首诗:“在这疲倦的无眠的夜半,总像远方正有个匆忙的使者/不分昼夜地赶他的行程。/等到明天的清早刚一朦胧,他便跑到我的门前,指我的姓名呼唤。/他催我快快地起来/从这张整夜无眠的空床;他说,你现在有千山万水须行!”诗中的“我”就如同歌德笔下孜孜以求、自强不息的浮士德,“我”只有不断努力、永不停歇、始终向前,才能获得圆满。正所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5]除此而外,《无眠的夜半》还体现了歌德蜕变论的影响:“我不由自主地跟随他走上征途,/永离了这无限的深夜,/像秋蝉把它的皮壳脱开。”而《夜》这首诗则隐含了歌德反否定论的思想:“我夜夜回到我的家里,/像是从一条很远很远的道路:/‘我今天所走的都是迷途’——/明天的道路我要从重新开始。”在自强不息的途中,总不免要走些迷途,然而正是由于这迷途或者是走上这迷途的阴暗冲动,对于孜孜不息的人反而是一个有力的刺激,使他更积极地努力。就好像《浮士德》里的魔鬼靡非斯托非勒斯,他不断引诱浮士德走向堕落沉沦,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促成了浮士德向善。《海歌》一诗则为我们展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在海水的那边,/是些迷路的灵魂:鸟儿没有巢,船儿没有坞。”在这里,流浪的鸟儿和漂散的船儿都是现代人无家的宿命的象征,体现了鲜明的存在主义思想:即作为生命个体,在人世间的本然处境是决然孤独、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

总之,这四首诗是诗人所做的一次初步自觉的现代性尝试,它们挣脱了早期诗歌情感化的包裹,上升为一般的哲理层面的表达,是存在主义哲学、里尔克和歌德思想等因素共同影响之下的一次练笔,标志着冯至已经形成了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色彩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对冯至而言,这无疑是一次脱胎换骨,给他之后的思想、创作乃至生活都带来了至深的影响,尤其为他在40年代登上艺术颠峰构建了牢固的根基。

二 《给一个死去的朋友》:核心人称话语的转折

历经《昨日之歌》的浪漫抒情,走过《北游》的人生自省,又经受异域文化的熏染和存在主义的洗练,结识艺术道路上的知音里尔克之后,冯至逐渐形成了对人生、对社会、对艺术明确思想和观念。应该说,这是冯至在海德堡最大的收获之一,也是诗人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1935年9月,怀着对存在主义的信仰和对里尔克的崇拜,新婚诗人携妻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归国之途。然而回到祖国的怀抱之后,满目都是国家的衰弱残破和社会的腐朽黑暗,此时,不仅国共两党的围剿与反围剿已至白热化的程度,而且,日寇的魔爪已伸到华北,紧张

的国内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摆在国人面前。在此情形之下,大多数诗人都抛掉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梦”,走出象牙塔,“睁开眼睛看现实”,^{[4]608}积极地投入到现实生活的洪流中,写出带有明显现实性倾向的作品。

冯至却做出了与此不同的选择。随着抗战的打响和日益深入,随着混乱局势所带来的痛苦不断侵袭诗人的内心,天性多思的冯至转向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思考和追问,希图在艺术创作中把捉住生命的价值。这一转变应该不难理解,威廉·巴雷特的一段话便做出了准确而生动的阐释:“一个正在经历一场混乱和大动荡的社会,必然会使每个人遭受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本身却能导致一个人更接近自己的存在。习惯和常规是一块遮蔽存在的大幕布。只要这块大幕布位置牢靠,我们就不需要考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似乎已经充分体现在日常习惯的胜利之中了。但是,一旦社会的结构破裂了,人就突然被抛在外头,离开了他一度无意识地接受的那套习惯和准则。站在外面,他的问题冒出来了。”^[6]冯至关于个体生命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冒出来”的。

再者,早在回国之前,冯至的头脑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个体生命与个体存在的思想和认识。归国以后的几年里,诗人也是一边接触现实,一边继续沉浸在里尔克的世界里,从事对里尔克的研究和译介工作,创作了一些有关里尔克研究的论著,如《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和为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所做的译序,以及有关里尔克诗歌、书简的译著:《豹》《一个女人的命运》《啊!朋友们这并不是新鲜》《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和《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等。所以,在如上所述的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的影响制约下,冯至做出与众不同的选择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给一个死去的朋友》诗四首即是冯至做出这一选择之后所做的第一组诗。这四首诗创作于1937年,是诗人在归国以后到写作《十四行集》之前仅有的诗歌创作成果。它们是诗人为悼念亡友梁遇春所作,其中融合了里尔克的思想理念和艺术精神,表现了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显示了诗人日趋娴熟的现代主义诗艺。四首诗不仅体现了诗人对亡友梁遇春的缅怀,同时也触及到存在主义和里

尔克都极为重视的一个命题——死,并且,诗人也如存在主义和里尔克一样,认为死和生并非对立关系,将死视为人的“故乡”,不仅如此,组诗中还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和里尔克思想的联系观、交往观,如诗中描述的青年人与死,死者与生者,死者与陌生人,死者与自然风雨等等都是彼此牵连,割裂不断的。^[7]

回到人称话语这个问题上来,《给一个死去的朋友》诗四首中有两首(第一首和第二首)出现了复数人称“我们”:(1)“我如今知道,死和老年人/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连;/在冬天,我们不必区分/昼夜:昼夜都是一般疏淡。”(2)“我们当初从远方聚集/到一座城中,好像只有/一个祖母,同一祖父的/血液在我们身内周流。/现在无论在任何一地/我们的聚集都不会再有,/我只觉得在我的血里/还流着我们共同的血球。”特别是在第二首诗中,“我们”表面上看指“我”和亡友,实际上绝不仅只如此,它表现的是一种生与死的联系。总之,这里的话语人称“我们”显然有异于20年代的那个“我们”,20年代的“我们”主要指代恋爱双方,实际表达的是“我”的个人化的情感,而此处的“我们”则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的、集体的人称主体出现,表现的是一般哲理。因此,《给一个死去的朋友》标志着冯至诗歌人称话语的转折。从此,冯至的诗歌中开始频现“我们”这一主体人称,频率之高,在随后创作的《十四行集》中达60%左右。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澄明的是:早在1930年诗人出国前作的《等待》《夜半的园林》等诗中,就运用了话语人称“我们”,还有1934年诗人在留学时候所写的《雪后》一诗也用到了“我们”这一人称,而且当时诗人的思想也正在或自发或自觉地发生着变化,为什么不把它们视为人称话语转折的起点呢?首先,就《等待》等写于出国前的诗作来说,诗人的思想还处在转变的自发阶段,至于之后朝向什么方向转变、如何转变以及能否转变成功都还具有太多未知的因素。其次,从思想发生自觉转换之后所作的《雪后》等诗来看,虽然思想上的转变已经完成,但是,诗人还没有回到祖国,更没有亲眼目睹灾难深重的百姓生活,也没有亲身经历恶劣污浊的现实环境,因此,他的这种转变相对后来所写的《十四

行集》来说,缺乏相应的外部环境条件,还没有达到完整意义上的转化。也就是说,只有当诗人在归国后目睹了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亲历了现实的惨痛与悲苦之后,没有投身现实,而是转向求诸个体自身,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所写的诗,才达到完整意义上的转化。

在那个几乎不容个人精神存在的时代,冯至能做出如是的选择、如是的转变,更加突显了诗人思想的成熟、坚定,表明诗人已经完全超越了个人化情感,超越了时代情绪,而上升到智性的、哲理性的认识。虽然,也因此而使得有些人对冯至颇有微词,但对此我们是不能责求诗人的,因为“冯至并没有逍遥于时代之外,而是坚持以灵魂来倾听这世界的,他只是以内向的方式,企图唤起那些或沉睡、或麻木、或浮躁的灵魂,让每个个体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与义务。”^[8]更何况,从现在来看,冯至当时所写的那些抒写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义的诗作是超越时代的,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今甚至以后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耿传明.“现代性”的文学诉求—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性考察[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12-18.
- [2] 冯至.冯至全集: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3] 冯至.冯至全集:1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23.
- [4] 冯至.冯至全集:1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5] 冯至.冯至全集:8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8.
- [6]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M]//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1.
- [7] 宋妍.浪漫主义与审美主义辨析[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99-106.
- [8] 王邵军.生命在沉思—冯至[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119.

责任编辑:黄声波